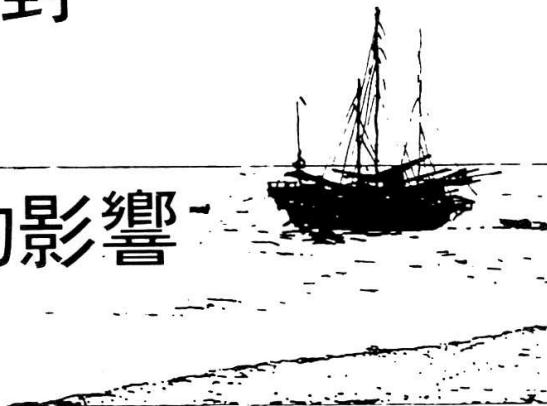


評保羅·高漢著：

基督徒的傳教及其對

二十世紀初葉的影響



杜克禮著
游麗清譯

高漢所撰的「基督徒的傳教活動及其對二十世紀初葉的影響」一文，原載於「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十卷，晚清歷史（一八〇〇年——一九一一年）第一部份，頁五四三——五九〇。該書主要由 JOHN K. FAIRBANK 及 DENIS TWITCHETT 編著，一九七八年由劍橋大學出版。

(一)

論及十九世紀基督宗教在華傳教活動的著作，多如雨後春筍。有些著作所描繪的傳教士是一群意向高尚、為傳福音而盡心盡力

的人，他們不畏任何艱險，把基督信仰傳入中國；但另一些則把傳教士視為一班意圖控制中國思想的文化侵略者，他們的行徑與其同胞致力於駕御中國經濟的所為，相去不遠。

本文無意討論上述兩點，只想評估一下十九世紀傳教士對中國的影響，而暫時擱置不去探討他們的動機。高漢所著有關「基督徒的傳教活動及其對二十世紀初葉的影響」一章，對我的探討很有幫助。

本文除了略為探討十九世紀基督宗教在華的歷史以外，還希望向「鼎」的讀者介紹一下高漢先生的著作，以及「劍橋中國史」。自從保羅·高漢的「中國與基督宗教」（一九六三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問世後，他立刻躍升為學術界的權威，當時他是執教於美

國韋利斯理大學歷史系。在哈佛大學求學時，他曾是 JOHN KING FAIRBANK 的門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了西方研究中國史的翹楚，與他同時期的著名學者有：MARY WRIGHT, J. LEVENSON 和許芥培。

縱然高漢當時尚未被公認為中國歷史研究的權威，但他的文章能被列入「劍橋中國史」的晚清歷史書中，表示他的文章已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一九六六年，當最初構思這部歷史的編纂時，只打算編六卷，但現已增至十四卷（有些今日尚未出版；一如 FAIRBANK 在第十卷的序言中所說，這一點反映出西方學術界近幾十年來對中國的關注大大增加。

兩卷各有六百頁的晚清歷史（一八〇〇年——一九一一年），資料詳盡，涵蓋廣闊，決不像許多中國史一般，只着重政治和外交方面，而忽略了社會和思想的歷史。它依循劍橋歷史的一貫模式，每章由不同的學者執筆，與牛津歷史書系的習慣、從頭到尾都是出自一人之手的模式，恰成對比。（第十卷的作者還包括著名歷史學家 JOHN K. FAIRBANK, PHILIP KUHN, FREDERIC WAKEMAN, 劉廣京和郭廷以。）

有一點遺憾的是：該歷史著作的編者雖然都認為拼音法是翻譯名字的最佳方法，却在一九七六年仍決定選用舊式的 WADE-GILES 譯法。當然，拼音法在今天已被廣泛應用，而不懂錯綜複雜的 WADE-GILES 譯法的讀者，在閱讀這些文章時可能會有些困難，畢竟，該歷史書卷末附有一完整的中英譯名對照表，這對於不熟識羅馬拼音法的中文讀者，或想學更多中國字的

中國語文學生而言，會有幫助。

由於「劍橋中國史」相當冗長，故宜用作參考書，不適用作教材或全部細讀，同時，又由於它的價錢並不便宜（每卷約港幣伍百元），故由圖書館購買遠比私人收藏來得恰當。

(二)

高漢所寫的那一章，一開始便報告一八〇〇年以前中國境內的傳教活動。他巧妙地把中國和歐洲的發展連結起來，並扼要地說出當時西方基督徒在華傳教盛衰的歷史。

相信「鼎」的讀者對意大利籍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的事，不會陌生。他與同會兄弟們在幫助中國人皈依天主的事情上頗有成績。據高漢估計，到一七〇〇年時，中國有三十萬天主教徒。

但到了十八世紀，基督宗教在華的活動可謂頭頭碰壁。在所有的問題中，禮儀之爭要算是最嚴重的問題，它激怒了清廷，導致雍正帝於一七二四年禁教。當時，基督宗教雖未致於全部毀滅，却被迫成為「地下」教會，甚至被視為「旁門左道」，與一般被尊為「正道」的宋明理學相對立。在很多中國人的心目中，基督宗教的組織是不合法和不道德的，而這種想法正是對日後中國的傳教事業有很大的影響。

在十七及十八世紀時，中國人反對基督宗教主要是基於哲學和政治上的理由。很多晚明學者都在「破邪集」中大抒文章，從佛家、道家、和懷疑主義的觀點去攻擊基督宗教。至於中國政府方面，最重視的當然是基督宗教對政治的影響，（這是中國的一貫情況，只有當政府察覺到任何思想對政局構成

(三)

威脅的話，才會立刻大舉攻擊。) 清廷所顧忌的是傳教士和信徒們會破壞社會秩序和造成國內分裂。日本德川幕府在十七世紀初亦曾經以類似的原因禁教。

此外，十八世紀歐洲的發展，亦妨礙了西方在華的傳教活動。曾經一度是傳教先鋒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後衰落，而法國在啓蒙運動中所興起的「反神職」浪潮，亦遍及全歐洲。一七七三年，教宗解散耶穌會，終於，法國大革命以及連年不斷的戰火，使到歐洲無暇顧及外面的世界。

一八一五年，和平重臨，歐洲又開始復興，當時歐洲的統治階層傾向於保守，對宗教有利。一八二二年，法人成立了傳信會，而某些新的勢力亦同時興起，最重要的莫過於基督新教的介入，在此以前，基督新教只集中力量在本國傳教，可是，十八世紀的美洲啓蒙運動和大不列顛傳福音的復興運動，激發起宗教人士向外傳福音的決心。

再者，當時的歐洲日趨富強，有能力支持遠方的傳教活動，加上科技進步，使到傳教士可以安全快捷地抵達某些地區。況且，自十六世紀以來，西歐已逐步成為雄視世界的一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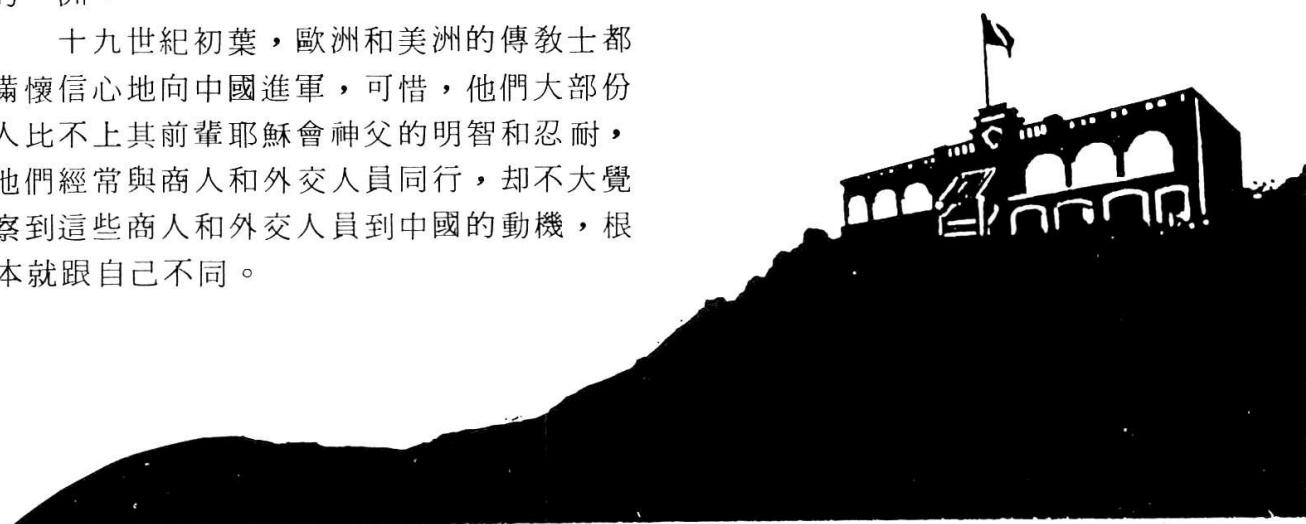
十九世紀初葉，歐洲和美洲的傳教士都滿懷信心地向中國進軍，可惜，他們大部份人比不上其前輩耶穌會神父的明智和忍耐，他們經常與商人和外交人員同行，却不大覺察到這些商人和外交人員到中國的動機，根本就跟自己不同。

當時，中國對於基督宗教的敵視態度並沒有多大改變，這種宗教依然遭受禁止，宗教活動亦僅限於澳門和廣州一帶，因為這些地方政府似乎從未積極執行禁令。

一八四二年之前的時期是預備和建基期。等到中國的門戶開放(雖然僅是局部)，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傳教士都感到焦灼興奮，紛紛整裝出發。他們如此滿懷熱誠，以致於很少會靜下來思索一下當時中國周圍的環境。

外國傳教士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沿海五個城市居留和傳教，是由於中英兩國於一八四二年在鴉片戰爭後所簽訂的南京條約。該條約包括中國割讓香港，賠款給英國，並讓英國商人對華貿易。無可否認，英國的勝利也方便了來中國傳教的傳教士，但這種關係却從此令到基督宗教在中國的發展遭遇麻煩。

高漢所着眼的不是這些外國傳教士來華的動機，而是他們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衝擊。從中國知識份子對基督宗教的批評、以及



它與西方侵略主義者的關係來看，傳教士初期所遭遇到的重重困難，是毫不出奇的事。更不幸，一八五一年在廣西所爆發的太平天國事件又加添了他們的困難。

考試落第的太平軍領袖洪秀全，曾經在廣州與某些傳教士接觸，他自稱爲耶穌基督的弟兄，並倡導一種類似基督信仰的宗教，雖然大部份在中國的傳教士視這種宗教爲褻瀆，但中國人民却更因此事件而增強對基督教的厭惡。一八五〇年代，太平軍叛亂已遍及中國中部，於是，曾國藩和一些學者便起來領導平抑暴亂，他們的口號和目標是：保衛清室，清剿太平叛軍，拯救中華文化。雖然太平軍之亂，罪不在傳教士，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國人更視基督宗教（及太平軍）爲相反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組織。

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的一連串不平等條約，又改進了傳教士和商人在中國的地位。法國政府使到傳教士在中國各地的傳教工作得到保障，而教會在十八世紀初期被充公的財物亦獲得發還。這些條約內的「優惠國」條款，亦惠及了其他國家的傳教士。

由於傳教士是在如此的環境下進入中國，所以他們往往受到敵視。十九世紀的官方記錄充滿這樣的例子，有些事件牽涉到暴力和死亡，有些事件則與傳教活動有關，有些事件亦來自傳教士本身的不智和不夠敏銳。高漢在他的文章中列舉了一些關於傳教士在廟宇前宣講反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及措施的例子。

高漢並不否認傳教士來華是滿懷好意的，然而，他們有時的態度，實在很容易惹起中國人民的怒火。但亦有傳教士懂得技巧和外交關係，未曾惹起麻煩和引起官方的注意

。所以，若只透過許多「教案」去認識教會在中國的傳教，則很難說是全面的了解。

(四)

以中國的龐大人口來看，中國境內的傳教士數總不算多，中國基督徒的數目也很少。高漢統計，一九〇〇年時是一個傳教士對十萬個中國人。然而，十九世紀在中國活動的外國人（尤以傳教士最爲顯著）所造成的怨恨却遺留至今。溫順天神父在「鼎」廿一期評論了「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該書的作者顧長聲對傳教士沒有多大好感，也代表了今日中國學者對傳教士的看法。

高漢用了醫學上的比喻來解釋中國人對外國人的強烈反應。他說，中國人對一小撮外國人的反應，就如一個龐大有機體對一個小得要用顯微鏡才看得到的外來個體的強烈排斥。又或者用另一個較粗糙的比喻來形容，這好比大象耳朵邊的一隻蒼蠅，雖然並不要緊，但也使之惱怒不已。

這些比喻，無論如何適當，也不足以說明一個現象，就是：中國人爲何如此敵視傳教士的活動？

原來，中國的上層人物，比如權貴，他們長久以來便是反對基督教的最有力者。很多傳教士都認爲中國的領導人物就是傳教活動的問題根源，因爲他們教唆百姓以行動來反抗教士。其實，權貴們很有理由去抱怨傳教士及其活動，因爲傳教士會威脅到他們在教育和知識方面的特權，他們尤其不喜歡傳教士對儒家的攻擊。

高漢指出了傳教士的一種「心理」，他們認爲中國的老百姓基本上接納他們，只是

(五)

那些善於懷疑的權貴，誤導了人民，使他們激烈地反對傳教士。但高漢強調，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一般人民之反對傳教士，實有他們本身的理由，（有些理由是想像出來的，有些却是事實）。當時，有些人信教是想藉宗教來作擋箭牌，從事非法活動，而傳教士竟也很天真，給予這些信徒保護，以為政府任何反對教徒的行動都是出於反西方宗教的成見。此外，政府對反教動亂中的受害者所作的賠償，往往都要藉着向人民徵收額外稅款來填補。

儘管有些反對基督教的理由並不充份，但人民依然執着於這些理由。傳教士既是外國人，他們的行徑又顯得有些與衆不同，故無法取得人們的信任。其次，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在中國興起了反教會的惡毒流言，指責傳教士和教徒的墮落和殘暴，認為這些劣行達到難以言喻的地步。不論是由於排外的情緒，抑或是由於有意把不認識和不喜歡的人視為最壞的人，這種情況並非只發生在中國。

地方官員對傳教士及其努力同樣不懷好感，雖然受到一八六〇年的條約限制，但他們始終懷恨在心。有一段時候，很多人都相信，這種不友善只不過是進一步顯示出權紳對基督教及其傳播的反感，又或者是反映出中國政府新政策的缺乏誠意。而事實上，地方官員對這宗教的敵視，主要是由於他們處於官方政策的要求與不可漠視的民衆情緒之間，感到左右為難。中國的官員，如果想好好管治一個地區的話，都需要得到鄉紳父老和百姓的支持與合作；那麼，如果他們徹底執行條約，他們就會引起當地人民的敵視，而導致本身的地位不保，在此情況下，他們都寧願採取中間路線，但却兩邊不討好。

這種不愉快情況，持續了差不多整個十九世紀，直至該世紀末，才開始露出曙光。

高漢文章末段的標題是：「傳教事業與新的秩序」。這個「新秩序」指的是：為數不斷增加的中國知識份子認為，中國如要在現代世界中求存，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傳統架構。



這群人數不多，却影响重大的知識份子的出現，正適逢其會，因為在傳教士當中亦不斷增加了專業人士，有很多投身於專門教育與醫療事業，而我們所要談的，就是這群傳教士。

他們除了興辦學校之外，還透過私人的接觸和出版刊物等方法，把西方知識介紹給中國學術界。他們這種做法，頗能誘發中國知識份子去認識基督教，在促進西方進步上所扮演的角色很有幫助。

但正如高漢所說，這種以傳播學術知識作為「香餌」，以吸引中國維新學者接納基督信仰的方法，並不可靠。雖然，有少部份學者，如王韜及何啟等是皈依了，但大部份却不然；況且，有些西方意識形態，也與基督信仰互不協調，甚至被利用來反對基督教，譬如：受到嚴復和一些學者所歡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根本是歪曲了達爾文的理論。依我看來，這種思想實在比中國的傳統宗教更加遠離基督信仰。

然而，傳教活動在學術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否認的，它擴闊了人們的知識領域，而只有心胸狹窄的人才會貶抑它。就像儒家學者康有為，他雖然於一八九八年倡導維新變法失敗，却仍認為，一些宗教作品也是促使他從事改革的因素。

不管怎樣，中國人欲尋求另一個新秩序，尚受其他的動力驅使，並非單是某一因果關係所使然。例如，帝國主義的不斷入侵，尤其是中日第一次交戰，中國慘敗，以及清政府處理事情的懦弱無能，相信都是刺激改革的重要因素；而傳教士把西方知識努力介紹給中國，以及他們對改革的誠摯投入，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六)

高漢一開始便問一個問題：若與其他在中國活動的外國人比較，傳教士來華的目的既是為了給予，而不是要獲得，那麼，他們為何會遭到如此待遇？……難道是他們激發起更大的恐懼和仇恨嗎？

簡單的解釋是：好意並不經常如此被人察覺。傳教士的「利他」行為有時比外國商



傳教士的「利他」行為有時比外國商人
的「貪心」行動更不易被接納，因為傳教士
所要尋找的，是人們的「心」。

人的「貪心」行動更不易被接納，因為傳教士所要尋找的，是人們的「心」，如此，他們就比單單圖謀物質利益的人更易冒犯中國人。

本文旨在闡述傳教士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境內所遭遇到的不友善待遇。事實上，他們在最不利的形勢下去傳教，有很多與他們有關的事件的發生，都是他們不能控制的，而偏偏他們又不注意到這些關係。

貶低過去不愉快歷史的重要性是不正確的。在八十年代，很多中國大陸以外的基督徒，都渴望與中國重新接觸，他們或許會不了解，為何他們所付出的努力會遭到懷疑，甚至國內的基督徒也懷疑他們。其實許多原因都與過去有關，而這些原因，也只能夠藉着研讀十九世紀的中國與基督宗教的歷史去了解。